



实现社会变革的非暴力途径

非暴力抗争方式源远流长，其代表人物包括印度的莫汉达斯·甘地和美国的马丁·路德·金。过去三十年中，非暴力运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在世界各地广泛兴起，抗议民众采用信息传播、抵制、静坐、示威游行等手段，促进了意义深远的社会变革。

(美国国务院电子期刊第 14 卷第 3 期, 2009 年 3 月)

本期目录:

前言..... 2

非暴力行动的力量..... 4

美国历史上的非暴力思想..... 8

社区组织者做什么? 11

网络竞选: 调动志愿者和选民..... 16

有效利用抗议的威力..... 20

战争会消失吗? 24

囚犯的困境和其他机会..... 28

旺加里·马塔伊: 和平之树..... 32

希林·伊巴迪: 信仰自由..... 34

乔迪·威廉姆斯: 地雷与网络..... 36

杰弗里·卡纳达: 儿童传送带..... 38

弗朗辛·普罗斯: 文字与作家的捍卫者..... 40

凯瑟琳·千和德里克·埃勒曼: 与人口贩运作斗争的大学生..... 42

参考资料..... 44

前言

莫汉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和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及其追随者不甘屈从压迫和接受二等公民的地位，他们积极通过切实可行和非暴力的途径来为人民争取自由。

过去30年来，世界各地促进人权和抗议专制政权的非暴力“人民力量”运动风起云涌。抗议民众采用信息传播、抵制、示威游行及其他手段，显示了非暴力行动比武装暴动更能够促进社会变革。

有关非暴力的英美传统理念可追溯到几个世纪前，其影响遍及美国大大小小的社区及更广泛的地区。今天，美国的社区组织者帮助公民面对地方民选政府伸张自己的权力。在世界各地，人们发起多种多样的非暴力行动，包括保护地方森林、帮助村民免受地雷伤害、为儿童提供受教育的机会。

基于互联网的社交网络的兴起为公民推动变革提供了更加强有力的手段，奥巴马总统(Barack Obama)2008年的竞选活动就是一个例证。

互联网咨询顾问克莱·舍基(Clay Shirky)在收录于本期的文章中写道：“每当你提高某一团体的内部交流能力，你便改变了他们能够共同成就的事业。”

一个大家都熟悉的例子是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Bogota)的年轻人发起的“我们不要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No Mas FARC)的脸谱网组织。他们在网上筹备抗议恐怖组织“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的示威游行活动，动员起世界各地190个城市的1200万人走上街头。2008年12月，这个团体的负责人在纽约与来自15个国家的其他青年组织会晤，成立了青年运动联盟(Alliance of Youth Movements)，致力于运用互联网技术展开反暴力活动。

近来的科学研究揭示，这些运动植根于人类的心灵深处。相反，战争不一定是人的本性使然。博弈论(game theory)指出，虽然和睦相处也并非人的本性，但在某些条件下，人能够学会合作，从而使每个人都受益。

本期杂志的撰稿人共同阐明了一个道理：推动积极的变革无须走武装暴动的道路。他们一致认为，非暴力活动的方式值得尝试。

一编者

非暴力行动的力量

作者：斯蒂芬·叔内斯(Stephen Zunes)

武装斗争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非暴力“人民权力”运动的成功则依赖于促使人们关注官方的压迫，赢得广大民众的支持。

斯蒂芬·叔内斯是旧金山大学(University of San Francisco)政治学教授，曾主编《非暴力社会运动》一书(Nonviolent Social Movements, Blackwell, 1999)，并担任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on Nonviolent Conflict)学术顾问委员会主任。

二十世纪以来，非暴力运动一直是政治生活中的一项内容，它向滥用权力的当权者提出挑战，推动社会改革，要求结束殖民统治，反抗军国主义和歧视行为。

印度的莫汉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和美国的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都是天才的战略思想家和伟大的道德领袖，他们或许是非暴力运动最著名的领袖。他们不仅致力于将非暴力行动当作展开斗争的最有效途径，而且把非暴力作为个人道德理念坚守不移。在很多方面，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坚持非暴力原则的做法具有开创性，因为绝大多数非暴力运动及其领导人并非绥靖主义者，而是主张把非暴力行动当作推动其事业的最佳战略武器。

确实，近几十年主要呈非暴力形式的斗争不仅推动了巨大的政治和社会改革，促进了人权事业，而且导致了专制政权倒台，并促使一些国家的领导人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的运作方式。其结果是，非暴力反抗运动从与宗教或道德原则相关的权宜之计逐渐演化成深思熟虑的、甚至是制度化的斗争方法。

的确，过去 30 年里涌现出以非暴力方式反对独裁统治的高潮。在这段时期，主要呈非暴力形式的“人民权力”运动对促进近 60 个国家的民主变革发挥了作用，促使很多国家推行实质性的改革。在其他一些国家，虽然非暴力反抗运动最终遭到镇压，但对专制统治者造成了强有力的冲击。

这些非暴力活动是有组织的、广受人民支持的反抗活动，出于策略或迫于形势，其领导人和参加者竭力避免武装斗争。

与传统的政治运动不同，非暴力运动一般运用竞选和游说等主流政治博弈途径之外的策略，例如罢工、抵制、大游行、争取言论空间、拒绝缴税、销毁代表政府当局的象征(如官方颁发的身份证等)、拒绝服从官方命令(如宵禁令)、以及建立提升运动政治合法性的团体和社会组织等。

非暴力抗争方式为什么奏效

很多年来，有一种假设认为，独裁政权只有通过人民的武装斗争或外国军队的干预才会被推翻。但是，人们逐步认识到，事实上非暴力行动可能比暴力行动更加强有力。最近的一份学术研究对上世纪 323 起争取自治和摆脱独裁统治的重要抗争行动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主要的非暴力运动的成功率达 53%，而同期内主要以暴力进行反抗的运动成功率只有 26%。(请参见 Maria J. Stephan 和 Eric Chenoweth 所著：“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Logic of Nonviolent Conflic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1, Summer 2008.)

抗争运动放弃武装斗争而走非暴力道路有多种原因。其一是人们日益认识到反叛战争的代价不断增加。近年来，科学技术为现政权镇压武装叛乱提供了越来越大的优势，使之能够较有效地击溃反叛武装，或至少使之失去对抗的力量。即便在武装革命运动取得胜利的时候，也造成大部份人口流离失所，农场和村庄被摧毁，城市和国家的基础设施受到严重破坏，经济崩溃，环境大范围地遭到严重破坏。最终结果是，人们日益认识到，武装暴动的益处与付出的代价相比也许太不值得。

另一个主张非暴力的原因是，通过武装斗争推翻独裁统治后，新政权往往不能建立保障社会及经济发展和促进人权的多元、民主和独立的政治体制。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包括：反动势力、自然灾害、外国干涉、贸易制裁、以及取胜的人民运动所无法控制的其他原因。

另外，把武装斗争当作夺取权力的手段往往激化问题，同时带来其自身的麻烦。其一，武装斗争往往陶冶秘密精英先驱者的情怀，轻视民主和多元化，不够宽容。情况往往是，本来可以在非军事化的机制中和平解决的分歧没有得到解决，从而导致派系间的流血斗争。一些国家通过武装革命运动推翻殖民者或地方独裁者后不久即发生军事政变或者内战，另一些国家则变得过份依赖外国提供其维持政权所需的武器。

另外，人们还日益认识到，武装反抗运动往往让那些没有明确立场的人感到担忧，致使他们转向政府寻求安全。在面临暴力反叛活动时，一个政府能够毫不费力地为其实行压迫找到借口，但是对非暴力反抗运动使用武力则通常使政府的反对派得到更多同情。有人指出，这一现象与合气道武术相似，即反对派利用政府的压制措施扩大影响，以达到运动的目的。

此外，非暴力反抗运动能够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因此其参与者远远不限于游击队招募的那些身强力壮的男青年。非暴力反抗运动还鼓励建立替代机构，这样做可进一步突破压制，并构成新的独立和民主秩序的基础。

武装反抗运动由于导致压制手段合法化而经常产生适得其反的结果。许多专制政权对反对派诉诸暴力感到高兴，甚至使用密探煽动暴力，因为这样可以为其镇压行动提供借口。相反，对非暴力异议人士进行暴力压制往往促成非暴力斗争局面改观。政府对和平示威群众的袭击可能促使偶发性抗议活动转变为大规模反抗运动。

分化现政权的支持者

非暴力反抗运动还往往在支持政府的力量中造成分歧。在如何有效对付反抗运动的问题上经常出现分歧，因为政府一般都知道如何镇压武装暴动，却很少能够妥善应对非暴力运动。对和平运动进行暴力镇压往往会改变普通百姓和精英人士对现政权之合法性的看法，这正是当权者对非暴力运动较少进行镇压的原因。此外，在现政权的一部分支持者看来，与进行武装斗争的反抗运动相比，政府与非暴力反抗运动达成妥协的后果不那么令人担忧。

至于那些并非积极支持现政权的警察和军人，非暴力运动还增加了他们开小差和拒绝参与镇压的可能性，而武装反叛则会加强政府暴力工具的作用，使之视自身为公民社会的保护者。非暴力运动的道义力量对影响公众、政治精英和军队等关键性群体的看法至关重要，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会不加质疑地支持以武力镇压暴力反叛。

非暴力反抗运动对现政权的支持者的分化功效不仅体现于削弱军队的镇压意愿，而且体现于促使整个国家乃至外国有关方面的态度发生转化，南非的反种族隔离斗争即为一例。和平示威的民众——包括白人、神职人员和其他“良好公民”——的电视镜头在世界各地播放，给予反种族隔离运动以合法性，并以武装斗争无法实现的方式动摇了南非种族主义政权的统治。随着非暴力反抗运动在南非升级，以经济制裁和其他国际社会团结一致的做法为形式的外部压力增加了维持种族隔离制度的代价。

由于全球相互依存程度的加深，对某一冲突的宣传在外地可能与在本地同样重要。例如，印度的甘地曾努力争取曼彻斯特和伦敦的英国公民的支持，美国南方的民权运动组织者把信息传送至全美各地，特别是针对肯尼迪总统领导下的政府。

苏东集团内的抗争活动通过电视广播将消息从一个国家传播到另一个国家，赋予地方示威活动以合法性，使之看起来不再是由谋求变革的异议人士组织的孤立事件。全球新闻媒体在 1986 年反抗马科斯的人民权力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促使美国政府减少了对这位菲律宾独裁者的支持。在 1980 年代末期的首次“抗暴行动”（intifada）期间，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非暴力抗议示威的镇压引起了国际社会对巴勒斯坦人反外国军事占领活动空前的同情。如巴勒斯坦籍美国学者拉希德·哈利迪(Rashid Khalidi)所指出，巴勒斯坦人“终于成功地将他们受害的现实呈现在世界舆论界面前”。

作为非暴力反抗运动的一项着眼于未来的工作，建立非传统的组织结构为旨在实现根本性社会变革的努力提供了可行的道德依据。公民社会中的平行组织结构可能不断削弱现政权的控制力，如 1989 年事件前整个东欧的情形。

在菲律宾，费迪南·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在 1986 年丧失权力不是因为他的军队溃败和马拉卡南宫(Malacanang Palace)失陷，而是因为他的权威失去了足够的支持，马拉卡南宫因此成为唯一一个他能够有效控制的地盘。就在马科斯在就职典礼上宣誓连任时，反对派候选人、遭到暗杀的马科斯批评人士的遗孀科拉松·阿基诺(Corazon Aquino)象征性地宣誓就任人民总统。由于大多数菲律宾人认为马科斯在选举中有欺诈行为，因此绝大多数人表

示效忠阿基诺总统，而非马科斯总统。这种对一个权威及其合法性的效忠向另一个权威的转移是非暴力抗争获得胜利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成功的非暴力反抗运动中，随着公民社会组织的有效性与合法性日益增加和民众的广泛参与，政治权力可能从政府转向民间的平行机构。这些民间机构承担起越来越多的社会管理责任，为民众提供服务，并建立起与政府相似的职能，最终导致政府的能力下降，甚至被人民彻底抛弃。

“土生土长”

一些专制政权声称，接受西方政府资助的一些外国基金会为后来参加苏东国家“颜色革命”的一些反对派团体提供资金支持，因此拒绝承认这些民主运动的合法性，它们断言，“颜色革命”不过是美国或其他西方国家策划的“软政变”。然而，正如武装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并非源于苏联连续几十年对这些国家中左派运动的资金和物质支持，非暴力自由民主革命的爆发也不能归因于外国基金会的支持。缅甸一位维权人士在谈及缅甸长达数百年的人民反抗传统时指出，关于外部势力组织缅甸人民参加非暴力行动的说法就象教老奶奶剥大蒜一样。

革命的成功，无论其意识形态倾向如何，都是某些客观条件使然。确实，无论多少金钱都不能促使千百万人放弃自己的工作、离开学校和家庭去对抗全副武装的警察和坦克，去冒生命危险，除非他们是出于自愿。

历史上，外国政府通过武力入侵、政变和其他暴力方式颠覆现政权，建立非民主的少数人统治。与此相反，非暴力的人民权力运动通过增强占人口大多数的民主派的力量使政权的更替成为可能。

没有一个外国政府或外国非政府组织能够制定出一个标准的成功模式，因为每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力量组合各不相同。也没有一个外国政府或外国非政府组织能够收买或鼓动足够人数的民众掀起一场大规模运动，对国家政治领导层形成有力的挑战，而要推翻现政权就更加困难了。

因此，在人民遭受压迫的国家推动自由与民主的最大希望不是来自武装斗争，也不是来自外国强权的干涉，而是来自展开具有战略意义的非暴力行动的、采取民主运作方式的公民社会组织。

本文所表达的见解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美国历史上的非暴力思想

作者：艾拉·切尔努斯（Ira Chernus）

植根于16世纪欧洲的非暴力抗争思想于19世纪和20世纪在美国得到进一步发展，并传播至亚洲和非洲。

艾拉·切尔努斯是位于博尔德市（Boulder）的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宗教学教授，著有《美国非暴力思想史》（*American Nonviolen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一书。

当人们开始推动社会变革时，他们必须就是否用暴力来实现其目标做出决定。一些选择非暴力途径的人可能在原则上并不反对暴力，他们只是认为暴力不会有助于目标的实现，或者担心受到伤害，或者无法说服他人参与暴力行动。这种非暴力属权宜之计，或者说是实用主义的非暴力。

可是，几个世纪以来，许多有可能凭借暴力实现其目标的人——那些有资源、有勇气和有能力从事暴力活动的人——却自愿做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使用暴力的决定。对这些人而言，非暴力是一项原则。虽然很多人是在受到感情和文化因素的激励后接受非暴力原则，但他们也曾受到一个丰富的理性传统的影响，这一传统以令人信服的方式论证了非暴力的可行性。

该传统有如一条地下溪流一样贯穿着美国历史，其根源可追溯到16世纪新教（Protestant Christianity）时期开始时的欧洲再洗礼派（Anabaptist Christians）。再洗礼派教徒拒绝使用暴力，因为他们努力远离主流社会及主流社会的许多冲突。他们后代中的一些人来到美国，建立起现在人们熟知的“历史和平教会”（historic peace churches）。

深深卷入社会冲突的其他基督教徒在原则上做出仅以非暴力方式谋求政治和社会变革的决定，这是美国特有的贡献。这一进程始于美国宣告摆脱英国统治而独立前的殖民时期的公谊会（Society of Friends）——即贵格会（Quakers）——会员。这些人严格遵守其中一些会员领导的非暴力活动——反对将税赋用于战争、反对对美国黑人的奴役、反对迫害土著美国人以及迫使他们离开家园的行动。但是，贵格会主要是一个宗教组织，他们的非暴力主张的基础是他们的信仰。

1820年代和1830年代出现了一个巨大的转折。当时一个有着不同宗教背景的团体开始要求在美国废除奴隶制。这些废奴者几乎都是基督徒，但并非全都致力于用非暴力手段实现其目标。而其中那些坚持非暴力的人成立了第一个以政治社会变革为目标、而以非暴力为手段的团体。他们认为，上帝是宇宙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因此任何人不应当对另一个人行使权威。这是他们拒绝接受奴隶制的依据。但是，由于暴力从来就是行使权威的一种形式，因此，他们自然而然地也反对暴力。

基于同样的逻辑，著名散文作家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宁愿坐牢也不愿意向政府交税，因为政府将税款用于打仗和维持奴隶制。1849年，梭罗在他的著名文章“论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中说，无论受到什么样的惩罚，他决不会遵守不公正的法律，因为人民应当遵循自己的良知，而不是盲目服从政府的要求。梭罗的主要目标是维护自己的道德原则和按照自己心目中的真理行事的自由。但他也指出，如果足够多的人拒绝遵守不公正的法律，那么他们可能会“阻塞”国家机器。

托尔斯泰和甘地

受废奴主义者和梭罗的著作启发，俄罗斯文学巨匠托尔斯泰（Leo Tolstoy）因此成为基督教非暴力的热情倡导人。他的著作对所有非暴力代表人士中最重要的一位、印度独立运动领袖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 (Mahatma) Gandhi）的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在20世纪，托尔斯泰和甘地的思想回传至美国，激励了很多美国人——他们往往不了解，非暴力的理论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他们自己的国家。

对甘地来说，非暴力与其说是行动，还不如说是意图。他把“暴力”界定为强迫某人做其不愿做的事情的意图。抵制、封锁和拒不服从法律等非暴力行动看似强迫行为，但如果真正本着非暴力精神去做，这些行为不过是遵循个人心目中的道德真理行事的方式。其他人能够选择以任何方式回应。甘地的一位追随者表达了与梭罗类似的主张：“我做的是我认为必须做的事。而你做任何你认为必须做的事。你可以监禁、殴打、甚至杀害我。但是你不能剥夺我信守我的良知的自由。”

甘地认识到，他是在呼吁人民根据自己对真理的主观认识而行动。他说，没有人能够知道全部真相。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可能性，即在事情过后我们发现自己是错误的。这正是我们决不尝试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原因。但是对于今天我们眼中的真理，我们必须坚持——即使危难当头。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自己去发现在某一情形下真理到底是什么。

既然有原则的非暴力意味着非强制性，坚持非暴力的人认为，他们从不试图按自己的愿望去改变某一局面。他们不是在为自私的目的而奋斗，而是为他们眼中的整个世界之利益而奋斗。事实上，在甘地看来，他们决不当对他们行动的结果有任何担心；而只需确保每时每刻都在做合乎道德的事情。信守道德真理既是非暴力的手段，也是其终极目标，正确的过程即是目标。因此，不应以是否能够产生效果来评判非暴力行动。

美国最著名的非暴力倡导者是1950年代和1960年代非洲裔美国人民权运动的代言人马丁·路德·金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 Jr.）。与甘地一样，马丁·路德·金认为，非暴力行动应该始终基于对所有人的福祉的关心，甚至包括那些不公平的人和压迫者。他宣称：“我们谁都逃不出这个相互依存的关系网，它将我们包裹在命运织成的衣襟之中。凡事若直接影响到一个人，都会间接地影响到所有其他人。”

与甘地不同的是，马丁·路德·金关心他的行动的效果。他对民权运动战略的评判不仅基于

其内在的道德价值，还基于这些行动对结束歧视黑人的现象是否有效。他希望引发冲突和在政治上赢得胜利。

但马丁·路德·金指出，只要我们是通过非暴力方式争取公正与平等，冲突就会给每个人带来更大的公正与和平。因此，在他看来，个人成功与社会利益之间并没有矛盾："我们是幸运的：我们最根深蒂固的道德感与我们的自身利益紧密相连。"他说，甚至在我们的行动涉及毫不妥协的对抗和压力时，只要我们的动机是对冲突双方无私的爱，我们便是在为使对立双方取得和谐和改善所有人的生活作出努力。甘地肯定会赞同这一思想。

非暴力行动的效果

美国的民权运动表明，如果我们以此为评判标准的话，非暴力能够产生效果。在1960年代，在很大程度上受民权活动人士成功的激励，旨在结束越南战争的非暴力运动为说服美国政府从越南撤军发挥了巨大作用。

在1960年代以前，基督教信仰激励了大多数致力于原则性非暴力行动的美国人。但是，反越战运动吸纳了许多非基督徒。1941年成立的犹太人和平协会（Jewish Peace Fellowship）显著扩大。越南僧人一行禅师（Thich Nhat Hahn）以及后来的达赖喇嘛为新兴佛教和平运动提供了指导思想。

还有很多不属任何宗教的美国人受到非暴力运动的吸引。他们能够从女权运动倡导者芭巴拉·戴明（Barbara Deming）的作品中受到鼓舞。她写道，非暴力运动必然具有强制性，但是它仅仅促使人们不再做他们没有道德权利去做的事情，而不影响他们去做任何他们有权去做的事情。对于被迫作出改变的人，非暴力方式使之产生仇恨心理的可能性最小，因此，它是实现持久性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最有效途径。

在美国，自1960年代以来，有原则的非暴力行动已经被运用于日益广泛的政治议题，尽管信奉这一原则的人仍然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

美国的非暴力运动也在世界各地引发了类似的运动。这些运动极大地改善了各国民众的生活条件，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从东欧到菲律宾的广大地区，专制政权纷纷被推翻。在北爱尔兰、危地马拉、东帝汶和其他一些地方，非暴力活动人士帮助结束了旷日持久、积怨很深的长期冲突。他们目前在世界各冲突地区的许多战线上积极展开活动。从历史观点来看，美国正处在以非暴力方式实现社会和政治变革这一全球性进程的核心。

本文所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社区组织者做什么？

凯西·帕特里奇 (Kathy Partridge)

千百万美国公民通过社区组织者学会了如何促使政府做正确的事情。

凯西·帕特里奇是多元宗教基金组织 (Interfaith Funders) 执行主任。该组织是由宗教和非宗教捐款人组成的网络，致力于推动以教会为基础的社区组织工作。

在 2008 年的总统选战中，当时的总统候选人巴拉克·奥巴马 (Barack Obama) 用他作为芝加哥一名社区组织者的经历来说明他熟知普通百姓面临的问题。

他的竞选对手指出，社区工作者不像市长或州长那样承担“真正的责任”。

事实上，社区组织者担负着许多实实在在的责任。

让我们先讲一个故事。一个居民区的一些妇女去看新来的“社区组织者”。她们听说他能够解决问题，而她们毫无疑问看到本居民区里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糟糕的学校、藏匿毒品的房屋、肮脏的街道、不健全的医疗服务等。她们坐在一个简易而拥挤的办公室里，向这位社区组织者倾诉她们的苦衷。

他说：“这些显然都是问题。”

这些妇女问：“那么，你打算如何解决呢？”

社区组织者的回答令她们感到不可思议：“什么都不做。”他接着说道：“这些不是我的问题，而是你们的问题。我们来讨论一下你们打算怎么办。”

这个真实的故事概括了社区组织者做什么，不做什么。社区组织者不“解决问题”，不提供服务或发表震撼人心的讲话。社区组织者消除中低收入社区面临的问题和不公正的办法是：帮助当事者或受害者共同行动，自己动手改变现状。社区组织的一条不可动摇的基本原则是：“决不要为别人做他们自己能够做的事情。”

社区组织是一项有计划、有目的的活动：招募社区领袖并增强其权能，将人们聚集起来，找出问题、制定解决方案，并敦促决策者改善某一社区、城市或社会经济阶层的生活。

招募社区领袖

社区组织者招募社区领袖并增强其权能，而不是自己去充当代言人或在某一问题上独自采取行动。他们这样做是因为他们认为，人们在对自己的生活产生影响的决策中发挥作用是一项民主权利。

弗雷德·罗斯(Fred Ross)是一名经过培训的社区组织者。他 1960 年代在加利福尼亚一些墨西哥移民社区从事社区工作，目睹了当地赤贫的生活条件和薪水极低的艰苦工作。他在那里认识了一位年轻的父亲塞萨尔·查韦斯(Cesar Chavez)。查韦斯对罗斯要他当社区领袖感到恼火。他后来讲述了他如何邀请罗斯在他家里与当地入见面的情形，当时他是想吓唬吓唬罗斯，把他赶走。“可是，他开始讲话了，他越讲，我的眼睛睁得越大……当时有两个喝得烂醉的人想把他收拾一顿。但是我们让他们滚蛋。这家伙讲的是有道理，我想听听他要讲什么。”

罗斯感到查韦斯有担任社区领袖的才能，于是一次又一次地来找他，鼓动他坚持自己的信念，直到查韦斯确实相信自己能领头。查韦斯后来成为一名倡导社会公正的英雄，担任了农场工人工会(United Farmworkers Union)的领袖。该工会与农场主签订了公平劳动合同。在他的激励下，许多人参加了反越南战争以及争取少数族裔和妇女权利的社会运动。

社区组织者将人们联合起来，共同找出问题的症结。他们不是提供社会服务，而是让人们探讨共同的问题并采取集体行动，帮助人们在此过程中增强信心和掌握参与公民事务的技能。

他们的组织工作的第一步是与人们个别交谈或在他们家中举办聚会，借此找到有领袖才干的人和发现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社区组织者的帮助下，参与者确定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然后公开地展开实现变革的工作。

这些社区新领袖在一道工作的过程中，与其所在的教会、学校和社区的人们建立起更加牢固的关系。然后，他们发现其他教会、学校和社区的人有着同样的关切。他们就这样搭建起跨越宗教、阶层和种族鸿沟的桥梁。这一组织进程能够产生转型力量，给个人、社区乃至整个社会带来积极的变革。

钱还是人

社区组织的第二条基本原则是：“力量来自有组织的金钱或有组织的个人。”既然贫困社区资金匮乏，因此社区组织者只有依靠人。

当埃内斯托·科尔特斯(Ernesto Cortes)于 1970 年代回到他的家乡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市时，他发现市里较贫困的拉美裔街区缺乏其他街区享受的服务，这令他感到愤怒。事实上，那里的街道因缺乏雨水排放系统曾造成一名儿童溺水身亡！作为全国性网络组织工业

区基金会(Industrial Areas Foundation, IAF)的一名训练有素的社区组织者,科尔内斯前往当地的天主教教会,鼓动教区居民要求市政府进行大规模的道路基础设施和下水道维修,以增进公共安全。

在圣安东尼奥市取得一些成功后,科尔特斯前往得克萨斯州其他地方展开工作,从休斯顿之类的大城市到与墨西哥接壤的农村居民区,建立起一个将很多机构联网的规模巨大的新组织模式,使之能够在州一级的问题上采取行动。他们动用了800万美元的资金,帮助工业区基金会的联盟学校争取1997-1998年得克萨斯州补充拨款;建立起1200万美元的基金会,为贫困家庭临时救助计划(Temporary Assistance to Needy Families)的受益者长期举办培训;设计了2.5亿美元的州政府债券融资计划,为得克萨斯-墨西哥边境的乡村居民提供饮用水和下水道服务。

在那以后,科尔特斯前往洛杉矶,继续发挥他的组织才能。2004年,工业区基金会组织的洛杉矶分会“ONE-LA”举行首届会议,有12,000多人参加。会议发起一系列活动:清除学校附近的有毒垃圾,改善街道照明,推动一项10亿美元的债券发行计划以提供低收入住房补贴。

组织者与社区领袖一道开展有效的民间运动,为民众关切的问题寻找解决方案。例如,社区组织推动改革协会(Association of Communities Organized for Reform Now, ACORN)拥有一个遍布全国100多座城市的网络和400,000多万个家庭会员。该组织在很多议题上积极展开活动。

当卡特里娜飓风(Hurricane Katrina)导致新奥尔良数日淹没在洪水之中时,当地ACORN分会的组织者——其中很多人丧失了自己的住宅——走遍紧急庇护所,用手机寻找失散的ACORN成员,并到市政府和国家官员面前要求政府在重建中公平对待贫困人口。虽然他们的要求尚未全部得到满足,但他们已经成功地获得一些资金,并把这些资金用来重建被洪水摧毁的社区和帮助数以千计的居民返回家园。

所有的组织工作都在地方展开,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工作只是小打小闹。在加利福尼亚的圣何塞市,全国性宗教社区组织PICO(Improving Communities through Organizing)的组织者了解到,很多家庭因为县政府用于公共诊所的资金有限而没有医疗保健服务,他们于是通过地方教会组织起来,要求县政府官员修改政策,并将活动扩大到PICO在加利福尼亚的其他下属组织。经过几年时间,PICO组织起一个庞大的联盟,促使政府把教育和卫生拨款增加了134亿美元。

社区组织的工作几乎遍及对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质量造成不利影响的每一种社会不公正现象，包括儿童医疗保健、工资、移民改革、廉价住房、学校改善、社区安全、就业培训等。

2008年12月，美国各地2500多名社区组织者和社区领袖在华盛顿举行集会，听取时任当选总统奥巴马高级顾问的瓦莱瑞·贾勒特(Valerie Jarrett)的讲话。他们对总统经济复苏计划的某些内容提出建议：防止拍卖住房并要求接受政府紧急援助的银行做出妥协；改革低效率的美国医疗保健体制，特别是为全体儿童提供医疗保险；为能够维持正常生活的就业提供培训。

有酬和无酬

社区组织者来自何方？他们可能是某一社区的居民，动员邻居一起采取行动，完全是为了信念而不是为报酬工作。他们中有很多人是教会领导者，在美国的几乎每一个社区都能看到他们从事小规模草根组织活动。

但是美国的有些社区组织活动规模较大并可能提供报酬。这种社区组织活动源于已故的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的工作。1930年代，阿林斯基在芝加哥屠宰牲畜围场区采用激进的方式组织工会，砥砺了他的组织技巧。他把各类族裔团体调动起来，为争取市政府提供公平服务而斗争，包括防范犯罪的警察服务和银行公平借贷服务。

许多不同年龄和族裔的男女人士现在担任专职社区组织者，他们的薪水来自他们为之工作的各个团体缴纳的会员费以及教会和民间基金会的捐款。很多社区组织是从各团体的普通成员中招聘而来，其他人则因参加全国性培训、校园培训或劳工运动而进入这个行业。

今天，美国的社区组织者可能就某个单一议题展开工作，也可能组织起某一类人，如残疾人。但更为常见的是，社区组织运动有目的地就多项议题展开工作，联合不同的社区和群体，或跨越不同的宗教信仰和社会阶层。

奥巴马总统的社区工作经验来自综合性社区组织，此类组织的成员可能包括教会、学校、甚至足球队。在法学院就读之前，他于1980年代初在芝加哥南城为加马利尔基金会(Gamaliel Foundation)的全性网络工作，该组织为20个州的团体提供培训和管理。从法学院毕业后，奥巴马回到伊利诺伊州，并通过以前建立的关系继续从事社区组织工作。他在追求后来成为第一夫人的米歇尔时，带她参加在一个教会地下室的一次组织培训会议，并就此赢得她的芳心，后来传为佳话。

在2008年竞选总统期间，奥巴马聘请了曾经指导他做社区组织工作的一些先辈助选，他们成功地组织起一场为改革而竞选(Campaign for Change)的运动。在此过程中，他们广

泛利用了社区组织工作的方法，如建立一对一的关系、在居民家中聚会和建立社区小组等。

过去十年来，社区组织大大扩展了活动的地区和社区，并在策略和方法、改善公共政策和服务的有效性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展。现在社区组织活动已发展到有数千个团体和千百万公民参加的规模，堪与美国历史上最成功的社会运动媲美。

本文所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网络竞选：调动志愿者和选民

戴维·塔尔博特（David Talbot）

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在总统选举中获胜，显示出利用互联网筹集捐款以及有效发动大批志愿者共同努力的巨大威力。

戴维·塔尔博特是《科技评论》（*Technology Review*）杂志的首席记者。

2008年美国总统选举显示出利用社交网站实现变革的巨大威力。

2007到2008年，巴拉克·奥巴马的政治竞选活动大规模利用互联网，为支持者提供了简单易用的界面，供他们自我组织、捐款、宣讲医疗改革等具体问题并联络选民。其规模不仅远远超过了历届选举的网上运作，也使得奥巴马在民主党党内提名竞选中的对手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Rodham Clinton）以及后来大选中的对手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望尘莫及。

奥巴马的网络竞选策略是他早年在芝加哥担任社区组织者的经历的自然延伸，同时借助了大众对社交网站新产生的浓厚兴趣。

近年来，全世界亿万网民纷纷涌向“聚友网”（MySpace）、“脸谱网”（Facebook）、hi5和Orkut等交友网站，因为他们发现这类网站提供了与朋友联系、组织团体、分享兴趣爱好和参与某项事业的非常有效、简单的途径。奥巴马竞选团队在其中一些网站建立了网页，特别是“脸谱网”，这里有一个巨大的奥巴马支持者网络。

但最重要的是，奥巴马竞选团队建立了自己的社交网站，网址是my.barackobama.com，简称MyBO。这个网站是由设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一家私营公司蓝州数码公司（Blue State Digital）为他们量身定做的。这个网站的功效惊人。奥巴马竞选团队通过互联网得到了来自300多万选民的5亿美元捐款。奥巴马还招募了一支网上志愿者大军——这要归功于MyBO网站及其他一些策略，其中包括在竞选集会上要求与会者将自己的电邮地址通过短信发送给竞选团队。到竞选结束时，奥巴马已拥有一份包括1300万名支持者的名单及电邮地址，成效显著。

多种多样的选择

MyBO网站的显著特点是设计简单，并不断促请访问网站的人采取某种助选行动。当你进入MyBO网站，就会看到多种选择。你可以击键打开一份捐款的表格，你也可以点击另一个键为在家里组织一个支持奥巴马的小型聚会做准备，并下载竞选资料以便在聚会上分发给朋友和邻居。

如果你不想组织这样的活动，则可以查看标示着现有聚会的谷歌地图，找到你家附近的聚

会场所。点击图标便可看到地址和联络信息。你可以组织自己的筹款活动，请求朋友和熟人捐款，以达到你的既定目标。

在MyBO网站上，支持者自发的筹款活动从70,000人中募集了3,000万美元。值得一提的是，这类筹款活动基本不需要奥巴马的竞选团队做任何努力，从而使他们有精力从事其他工作。

你向奥巴马的竞选团队提供电邮地址后，便会收到竞选团队发送的邮件——有些是奥巴马的夫人米歇尔签发的，有些是前副总统阿尔·戈尔签发的。戈尔在2000年总统大选中败给乔治·W·布什，但后来因在全球暖化问题上的努力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这些邮件会请求选民采取当时有助于选举的具体行动，例如打电话给俄亥俄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等选情十分接近的几个关键州的摇摆不定的选民。

奥巴马竞选团队还分地区组织选民，例如向MyBO网站成员提供住在他们附近的未登记选民的名单，以及联络未登记选民并帮助他们登记投票的详细指南。竞选团队还请求支持奥巴马的退伍军人自发打电话助选。他们为这些志愿者提供了竞争激烈的各州的其他退伍军人的电话，上网便可以看到，供志愿者打电话助选。争取退伍军人的支持对于奥巴马尤为重要，因为他没有在军队服役的经历，而他的竞选对手约翰·麦凯恩是参加过越战并受过嘉奖的退伍军人，而且当过战俘。

多功能数据库

这些网络工具提供了利用大型美国选民数据库的途径，因而更有威力。民主党和共和党长期以来花费了相当大的资源建立起非常准确的名单，其内容包括美国每一位选民的姓名及其个人信息（主要是靠多年来各位助选志愿人员通过电话采访收集的信息）。这类信息包括选民更支持哪个政党，他们是该政党坚定的支持者还是略有好感，以及选民特别关注哪些问题。

两党各有自己的数据库，共和党对其全国性数据库的管理历来较为严谨、较有条理。但从2006年到2008年，设在马萨诸塞州萨默维尔的一家名叫“选民动员网络”（Voter Activation Network, VAN）的公司对民主党的数据库作了改进。选民动员网络公司根据同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签订的合同，将美国50个州的数据库连通，并在网上为支持者开辟了以有限的、能够控制的方式进入数据库的便捷途径。MyBO网站以及参加其他选举的民主党候选人的网站同这个刚刚得到改进的数据库连通，产生了极大的威力。

因此，在巴拉克·奥巴马成为民主党提名人后，任何普通志愿者——不论是登录MyBO网站，从其他民主党参选人的网站键连，还是从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官方网站键连——都能点击下载“选民动员网络”数据库内一小批选民的姓名和电话号码。这个名单还附有调查选民观点的书面问题以及记录选民答复的网上表格。

在党内提名竞选期间，普通支持者打过千百万个这样的电话。此外，MyBO网站还为志愿者提供了下载选民登记表的工具——根据需要提供适用于美国各个州的表格——供数据库中显示的尚未登记但根据人口特征可能是奥巴马支持者的选民使用。

奥巴马竞选团队在瞬息万变的党内初选期间高效地、广泛地使用这个数据库，帮助他赢得了民主党党内提名。这种借助于网上工具联系选民的方式在奥巴马和麦凯恩于11月全国大选中展开角逐时也得到了极其广泛的应用。这项策略亦可根据需要进行调整。例如，在竞选的最后四天中，MyBO网站的志愿者打了300万个电话给选民，主要是确保已经登记投票并且表示支持奥巴马的选民都能走出家门参加投票。

蓝州数码公司的创始人之一、首席技术官雅舍·富兰克林-霍奇（Jascha Franklin-Hodge）指出，这些行动的规模是以往其他任何竞选活动无法企及的。奥巴马的网络竞选活动不仅包括MyBO网站，还包括对从短信到YouTube视频等其他新媒体手段的有效利用。观看与奥巴马竞选活动有关的YouTube视频的时间总计达到1400万小时，观看人次总计达到5000万。支持奥巴马的“脸谱网”成员超过了340万人，是麦凯恩的六倍。

长期策略

巴拉克·奥巴马现已就任总统，他将如何利用所有这些资源呢？民主党现在拥有的美国选民数据库的规模是四年前的十倍，这要归功于所有网络志愿者打给选民的电话。这些数据不仅可以在今后的选举中用于进一步改善支持者根据具体议题组织起来实现变革的方式，而且有可能帮助普通美国人参与争取让政府颁布新政策的努力。

但民主党和白宫以外的奥巴马竞选组织将在多大程度上动用选民资料库或有1300万成员的电邮名单来帮助奥巴马实现其施政纲领尚不清楚。在奥巴马赢得大选的次日，他的过渡班子启动了一个新网站：<http://www.change.gov>。通过这个网站，他的过渡班子收集公众对政府政策的意见，播放他提出的内阁职位候选人的录像，并通过YouTube视频网站对各种意见予以答复。他的过渡班子还把向他们游说的各团体的名称及其主张在网上公布，并推出一个“公开征求问题”（Open for Questions）的栏目，访问该网站的人可向奥巴马政府写下各种问题并进行投票：在去年12月的一个星期内，就约有两万人提出一万个问题，并对这些问题投下一百万张选票。

但在总统就职典礼日（1月20日）那天，奥巴马政府关闭了www.change.gov网站，开通了一个新的总统网站——<http://www.whitehouse.gov>。截至一月底，该网站的互动型栏目虽然不多，但确实开始把奥巴马各种行政命令的全文公诸于众，并宣布了一项承诺：在奥巴马总统签署之前，任何非紧急法案都将在网上张贴五天，并附加一项供公众表达意见的功能。虽然还不清楚奥巴马政府会增设哪些专栏，但奥巴马的工作班子承诺要利用互联网来提供关于政府开支及其他活动的易于搜寻的文件，还要把更多公开的会议在网上播放。奥巴马除了继续沿袭数十年之久的白宫每周广播讲话传统外，已在YouTube上建立了视频讲话制度。

任何未来的大规模政治活动——或为争取社会变革等原因而开展的其他民众运动——都不可能忽视2008年的经验教训。预期共和党人将在2010年的国会中期选举和2012年的国会与总统选举中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巴拉克·奥巴马的胜利表明，基于互联网的组织工作能有效地动员民众，使他们成为一支与传统体制和权力中心匹敌的力量。确实，全世界都已注意到这一经验。蓝州数码公司(Blue State Digital)已开设了伦敦办事处来扩大其业务；选民动员网络公司对许多国外打来的电话应接不暇。支持共和党的互联网和数据库供应商有可能采取同样的行动。

显然，政治永远不会雷同。1992年，一位竞选活动的策划人曾用一句话来提醒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什么是竞选活动最重要的主题：“问题出在经济，笨蛋。”现在，让我们引用民主党一位长期从事竞选工作的人员乔·特里普(Joe Trippi)的一句话：“问题出在网络，笨蛋。”

本文所表达的见解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有效利用抗议的威力

克莱·舍基(Clay Shirky)

简便的新型通讯手段正在为普通民众组织集体行动扫除障碍，从而改变世界的面貌。

克莱·舍基在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任教，并就互联网技术的社会和经济影响提供咨询及撰写文章。他的最新著作题为《人人参与：不依靠组织的组织威力》(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

2006年3月27日，星期一，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市的中学生为抗议美国国会提出的要求惩处非法移民的《众议院第4437号议案》(HR4437)举行了一次罢课游行，让学校老师和管理人员跌破眼镜。这次罢课游行不同寻常，因为全市各所学校共有几万名学生参加。短短两天前拉美裔社区的成年人组织的一次抗议活动激发了这次主要由拉美裔学生参加的罢课游行。一群群学生走出校门，走向市府大厦，人数之多导致交通堵塞，他们以引人注目的方式公开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

这次抗议活动有几个惊人之处，首先是其规模之大——有数万人同时参与协调一致的政治行动。同时在多个地点组织这样的活动是困难的，要组织大多数为不满投票年龄的中学生参加这样的活动更加困难。如果还要组织可能永无投票权的移民参加，那简直是难上加难。在校方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组织这样的活动令人难以置信——让30,000人保守秘密绝非易事。而且要在48小时内一切就绪，本是不可能的事。的确，就在短短一年前还是不可能的。

促成秘密策划的大规模抗议活动得以迅速展开的是新型通讯手段的应用，尤其是“聚友网”(MySpace，互动社交网站)和“短信服务”(SMS，手机短信)。利用这些工具，学生们能够作为群体协调行动，而不仅限于个体之间。同样关键的是，他们交换的信息能够传递到既定对象——其他学生——而无需经过校方。

然而，为学生抗议活动提供可能，并不等于将其变成现实。将其变成现实的是真切的政治意愿：学生们要同声地、公开地表明一种观点。“聚友网”和短信赋予了他们过去所不具备的能力，从而使他们的观点传播得更广，但观点本身，即要求制定具有包容性的移民政策，并不依附于这些工具。

尽管早前围绕新型通讯手段的某些乌托邦言论宣称我们即将步入某种超越等级制度的天堂，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未来的情况也不会是这样。大规模的专业化媒体并未丧失任何

一种绝对优势。而已然发生的是，这些机构的大多数相对优势已经消失——这是相对于由公民直接控制的媒体而言。

其中的意义在于并无组织的群体实现其共同目标的新能力。人类是社会性产物，这既非偶然，也非巧合，而是一贯如此；而社会不仅是个体作用的结果，也是群体作用的结果。各个群体的沟通能力一旦得到改善，能够共同成就的事业也会不同凡响。

发表言论就是公开发布信息

这些变化体现在公民与媒体已然改变的关系中。常言说，“只有拥有一台印刷机的人才享有新闻自由”，这从反面揭示了互联网和手机的重要意义。在数码通讯领域，发表言论就是公开发布信息，在网上公开发布信息就是打开了同其他人沟通的大门。随着将人际交流、大众传播和社会协调相结合的媒体的出现，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结社自由现在也交叉融合了。

随着交谈、传播和社会元素融合为同一媒体，我们进入了每一件数码媒体都是一个潜在社群的世界：对某篇文章、某张图片或某段视频感兴趣的人很可能也有兴趣互相对话。通过社交媒体使各个团体同步的做法为传统媒体添加了一个新功能，即它不仅是一个信息源，而且是一个协调站。以洛杉矶学生罢课为例，“友你友我”网站集多种功能于一身，为学生们提供了一个发布有关众议院第 4437 号议案的信息的平台(传播功能)，让他们能够直接就这项议案交换意见(交流功能)，并让他们能够提出集体行动的方案(协调功能)。

如果借用军事术语，可以说数码媒体能够形成“共享认知”，即在一个团体内，不仅每个成员都了解事态，而且所有成员的认知都是相似的；更为关键的是，每个成员都理解这种相似性。“共享认知”是协调行动的有效前提，而“共享认知”能力借助于实时媒体和移动媒体得到了改进。

利用快速短信和移动短信增进“共享认知”的最新手段是“推特网”(Twitter)——通过手机或个人电脑向订阅你在“推特网”上发布的最新信息的任何一位朋友发送短信。虽然可以通过“叽喳网”发送任何一种短信，但“推特网”建议用户使用该网回答“你在干什么”的问题。

因此，“推特网”上的大部分内容通常是毫无意义的。以下是某个星期四下午的一段随意摘录的“推特网”上的信息：

PaulDizmag: 把用具从一个租借处搬到另一个租借处。

radiopalmwine: 金·桑尼·埃德(King Sunny Ade)——跳舞，跳舞，跳舞

Lisanae: 我今天倒霉透了。

Patorama: 上网买一支辉柏嘉(Faber-Castell)黑毛笔看来是不可能的。但我能买一包十支装的。我想我会有多余的。

很多公开的短信都有这种特点——尽情欣赏金·桑尼·埃德，搬运用具，倒霉的日子——大多数用户可能都不会对这种公开贴出的信息感兴趣。不过，大部分内容平淡乏味并不意味着所有内容都如此，下面这个 2007 年发自开罗的一系列“推特网”短信就是一个例子(附有短信的发送时间):

Alaa: 去都基(dokky) 检察官法官穆拉德指控我和马娜尔犯有诽谤罪(4月4日上午 10:11)

Alaa: 等候检察官裁决真可能在拘留所过夜(4月4日下午 1:57)

Alaa: 我们要去都基警察局(4月4日下午 3:31)

Alaa: 警察局的高级警官都不在我们被晾在这里了(4月4日下午 4:29)

Alaa: 吉萨(giza) 保安处不放我们还得回都基警察局(4月4日晚上 7:59)

Alaa: 正在返回警察局的路上(4月4日晚上 10:25)

Alaa: 我们自由了(4月4日晚上 11:22)

Alaa 的全名是阿拉·阿卜杜·法塔(Alaa Abd El Fattah)，他是埃及的一名程序员，住在开罗，他也是一位民主人士和博客作者。他在这里记录了他和妻子马娜尔在开罗都基区(El Dokky)被拘留一事，以及他们在 12 个小时后获释的过程。拘留法塔的命令是一个名叫穆拉德(Abdel Fatah Murad)的埃及法官下达的。这个法官当时要封锁埃及的数十个网站，并指控这些网站“诬蔑《古兰经》、真主、总统和国家”。当埃及的民主派博客作者开始揭露这个封锁网站的阴谋时，穆拉德将他们的网站也列入他试图封锁的名单。

天平倾斜

“推特网”这种表面看来平淡乏味的服务平台能为法塔和其他埃及活跃人士提供什么呢？法塔是这样描述“推特网”的：“我们利用它让一个联系紧密的活跃人士网络得知抗议过程中安全部门的动作。这些活跃人士随后可以利用‘推特网’协同采取相应行动。”由于民主派活跃人士受到严密监视，“推特网”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实时和团体协调相结合的手段，有助于使行动的天平向他们那一侧倾斜。

在使用“推特网”之初，法塔和他的十几名同仁协同行动，围住了一辆被警方用来拘押他们的朋友马立克(Malek)的汽车，不让这辆车和车里的马立克被拖走。他们知道有人监视他们，就发出短信说还有很多人要来增援。警方增强了警力，包围了汽车，但也使汽车困在原地。马立克没有被带走，后来新闻记者和一些国会议员赶到现场。警方碍于公众舆论而将马立克释放，这样的结果在没有“推特网”的帮助下是难以实现的。

协调各个分散的团体的能力将继续增强：新型社交工具层出不穷。不论看上去多不起眼，任何增强“共享认知”或团体协调性的手段都能服务于政治目的，因为集体行动的自由本身就具有政治性。从中国到尼日利亚，社交和实时短信的应用日渐频繁的现象说明，我们为提升能力而采用这些手段，并为进一步提升能力而改进这些手段。

社交手段并没有创造集体行动，它们只不过是清除了集体行动的障碍。由于这些障碍巨大无比、无处不在，随着障碍得到清除，整个世界将面貌一新。正因为如此，很多重大变化并非最新奇、最尖端的技术的产物，而是以电子邮件、手机和网站等简便、易用的手段为基础。这些手段已在大多数人中间普及，而且最关键的是，大多数人都能在日常生活中自如地运用它们。引发革命的原因不是社会采用新技术，而是社会采纳新的行为方式。

本文所表达的见解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或国家科学院的观点或政策。

战争会消失吗？

约翰·霍根(John Horgan)

战争并非人类自然环境的一部分。文明提倡用非暴力途径来实现变革。

约翰·霍根是一名科技记者，现任纽约州史蒂文斯理工学院科学写作中心(Center for Science Writings at Steven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主任。他的著述包括：《科学的终结》(The End of Science)、《尚未发现的心智》(The Undiscovered Mind)和《理性神秘主义》(Rational Mysticism, Hoboken, New York)。

在各种形式的人类暴力中，战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群体间有组织的、导致死亡的暴力——具有最大的毁灭性。在整个人类历史上，许多伟大的思想家论述过战争，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曾提出以预防性战争作为解决两国争端的手段，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则预言战争终将结束。

然而，根据我在过去几年所做的调查，今天，大多数人不得不接受战争和军国主义这一不可避免的事实。在被问及“人类是否会停止打仗？”时，我任教的大学90%以上的学生回答说“不会”。很多学生提出的理由是：战争“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中”。

乍看起来，最近有关战争和侵略的研究似乎支持这一宿命论的观点。据伊利诺伊大学人类学家劳伦斯·基利(Lawrence Keeley)估计，90%以上的国家形成前的部落社会至少偶尔发生战争，而很多社会则是战事连绵。部落战争通常是些小规模冲突和伏击战，而不是大规模对阵。但在长期内，这些冲突造成的死亡率可能高达50%。基利指出，这些结果驳倒了18世纪法国哲学家让·雅克·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的论断，即在文明出现之前，人类是生活在与自然和谐及相互和谐之中的“高尚的野蛮人”。

一些科学家将战争追溯至人类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从遗传学角度而言黑猩猩是我们的近亲。从1970年代中期起，研究人员在非洲观察到，来自同一群体的雄性黑猩猩一起巡守他们的地盘，如果遇到来自另一群体的黑猩猩，便会殴打他，并往往直到打死为止。

哈佛大学人类学家理查德·兰厄姆(Richard Rangan)报告说，黑猩猩群体之间的暴力造成的死亡率与渔猎时期的人类死亡率近似。他说：“类似黑猩猩之间的那种暴力存在于人类战争之前，并为人类战争铺平了道路。在500万年持续不断的厮杀后人类依然存在实在令人惊奇”。

兰厄姆认为，在自然选择过程中占优势的是包括人类在内的有暴力侵犯倾向的雄性灵长类动物。他举出有关生活在亚马逊雨林中的一夫多妻部落雅诺马米人(Yanomamo)的研究为证

据。来自不同村落的雅诺马米男子经常发动致命的袭击和反袭击。加利福尼亚大学人类学家拿破仑·查冈(Napoleon Chagnon)对雅诺马米人进行了几十年的观察，发现男性杀手拥有的妻子和孩子的数目一般比从未行凶谋杀的人的妻子和孩子分别多一倍和两倍。

但是查冈坚决否认促使雅诺马米斗士厮杀的是他们的侵略本能。查冈解释说，真正嗜杀成癖的人自己往往很快被杀死，而不会活得那么久，以至于娶那么多妻子和生那么多孩子。

查冈说，成功的雅诺马米斗士通常非常有自制力，非常精明；他们打斗是因为在他们的社会中打斗是男人提升社会地位的渠道。此外，很多雅诺马米男人向查冈坦白说，他们憎恨战争，希望将战争从他们的文化中废除——事实上，过去数十年来，由于雅诺马米村落接受了法律和外部世界的行为规范，暴力发生的频率已经急剧下降。

并非人的本性

的确，战争的间歇性使很多研究者拒绝接受战争是人性不可避免的后果的观点。芝加哥菲尔德博物馆(Field Museum)的人类学家乔纳森·哈斯(Jonathan Haas)指出：“如果战争深深植根于我们的生理机制，那么它就会始终存在”。他说：“情况绝非如此”。他指出，战争绝不是像语言那样与生俱来的能力，而后者是一切已知人类社会始终具有的特征。

人类学家卡罗尔和梅尔文·恩贝尔(Carol and Melvin Ember)认为，生物决定论不能解释国家出现以前的社会或国家社会间的战争形态。恩贝尔夫妇负责管理耶鲁大学“人类关系区域档案”(Human Relations Area Files)，该档案库拥有过去和现在360种文化的资料。虽然这些社会中90%以上至少介入过一次战争，但其中有些社会战事连绵，而另外一些社会则很少打仗。恩贝尔夫妇发现战争频率与环境因素有关，特别是干旱、洪水和导致人们担忧生活必需品匮乏的其他自然灾害。

哈佛大学考古学家史蒂文·勒布朗(Steven LeBlanc)表示同意。他指出，根据马尔萨斯(Malthus)理论，战争的根源是食品和其他资源的匮乏。他说：“有史以来，人类从未能够在生态平衡中生活。无论我们生活在地球上什么地方，我们最终总是耗尽环境资源。这种情况导致我们始终把竞争当作生存手段，因此，战争便成了我们生态-人口失衡倾向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他认为，避免未来冲突的两种关键措施是：控制人口增长和找到替代化石燃料的廉价燃料。

对灵长目的研究还揭示了环境和文化因素的重要性。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ersity)研究灵长目行为的教授弗朗斯·德瓦尔(Frans de Waal)曾指出，通常进攻性极强的猕猴在温和的断尾猴抚养下变得不那么好战。通过加强灵长目动物的相互依赖——例如迫使它们为食物而合作——和保证它们能同样得到食物，德瓦尔成功地减少了它们之间的冲突。

在把这些经验应用于解释人类社会时，德瓦尔认为旨在促进贸易和旅行、从而促进相互依赖的欧盟（European Union）之类的联合体有着光明的前景。他说：“如果建立起经济关系，那么往往是为了争夺资源而发生的战争就可能消失。”

也许，现代战争研究得到的最有希望和最令人惊讶的数据是，作为一个整体，人类的好战性日益降低。两次世界大战和二十世纪的所有其他血腥冲突导致全球不足 3%的人口丧生，远远低于原始社会因暴力而丧生的男性比例，而原始社会的武器不过是棍棒和长矛，而不是机关枪和炸弹。

如果把战争定义为造成每年 1000 人死亡的武装冲突，那么过去半个世纪以来国家之间的战争相对很少，而内战在 1990 年代初期达到高峰后已经大大减少。

构成当今大多数冲突的是游击战、武装反叛和恐怖主义，俄亥俄大学政治学家约翰·米勒（John Mueller）把这些冲突形式称为“残余战争”（“Remnants of War”）。米勒拒绝接受对这一趋势所做的生物学解释，因为“雄性激素的水平似乎并不比过去低。”米勒指出，民主国家之间几乎从不发生战争，他把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战争的减少至少部分归因于世界各地大批民主国家的涌现。

需要更多的文明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史蒂文·平克（Steven Pinker）指出，近年来战争和其他形式的暴力减少还有另外一些可能的原因：第一，拥有有效法制和警察队伍的稳定国家的建立消除了霍布斯式你争我斗的无政府状态；第二，预期寿命的延长使我们较不情愿冒生命危险去参加暴力活动。第三，由于全球化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人类变得日益相互依赖，并对我们自己的部落以外的群体抱有同情心。平克的结论是：人类虽然很容易重蹈战争覆辙，但是“现代化力量促使形势不断向好的方面转化”。

总之，很多不同的研究反驳了战争是人类生存的常数的错误观点。这些研究还表明，与有关崇尚和平的高尚野蛮人的神话相反，文明没有制造战争，而是有助于防止战争。若想根除战争，我们需要的是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文明。

文明带来法律体制，使我们可以制定法律，通过谈判达成并实施协议来解决争端。这些从地方法院到联合国的各种机构极大地降低了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的暴力威胁。诚然，我们的机制远非完善。世界各国仍拥有大量的武器库，其中包括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武装冲突仍在许多地区肆虐。那么，除了上述提到的方案外，我们应该采取什么行动来促进和平呢？

埃默里大学人类学家梅尔文·康纳 (Melvin Konner) 建议把妇女教育当作减少冲突的又一关键措施。他指出, 很多研究表明, 加强妇女教育导致出生率下降。其最终结果是, 人口得以稳定, 从而减少对政府和医疗服务的需要, 减少自然资源的消耗, 并最终降低社会动乱的可能性。

降低出生率还会减少人口学家所称的“光棍”, 即未婚、失业的青年男性, 这一类人口与国家之间和国家内部暴力的相关度较高。康纳说: “帮助女孩受教育是对一个发展中国家所能进行的最佳投资。”

接受和平

显然, 消除战争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可以公平地说, 战争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也就是说, 它有很多不同的原因。若要实现持久和平, 也必须考虑很多因素。

社会科学家可以从两方面帮助推进和平: 一是公开摒弃战争不可避免的思想, 二是就战争与和平的原因展开更深入的研究。这一研究的短期目标是找到减少今天世界上的冲突的方法, 不管冲突可能在哪里出现; 长期目标是寻找人类实现永久和平的途径: 取缔军队、军备和军事工业。

在全球解除军备目前似乎不太可能。但是我们难道真的能够容忍军队和包括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在内的军备成为文明的永久特征? 直至 1980 年代末期, 全球核战争的可能性依然很大, 但是, 苏联令人难以置信地瓦解, 冷战以和平告终。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也在没有发生明显暴力的情况下结束, 同时, 促进人权的努力在世界各地取得长足的进展。如果战争的根源存在于我们的基因之中——这似乎是很多人当前的担忧——那么我们对和平的向往和维护和平的能力也应如此。

本文所表达的见解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囚犯的困境和其他机会

戴维·巴拉什 (David P. Barash)

根据博弈论，合作虽然不是那么容易实现，但是与冲突相比，合作往往是更佳选择。

戴维·巴拉什是华盛顿大学心理学教授，除其他著述外，他还与人合著有《和平与冲突研究》一书 (*Peace and Conflict Studies*)。

问题看似简单：人们为什么不合作？或者至少是：他们为什么不展开比现在更多的合作？归根结底，如果我帮你，你帮我，我们双方都会受益。是吗？同样，如果我们大家都走非暴力之路，岂不是人人受益？简言之，为什么回答罗德尼·金 (Rodney King) 在洛杉矶被警察殴打后提出的问题那么困难：我们为什么不能和睦相处而不诉诸暴力？

事实证明，这个问题的答案比人们想象的情况更复杂。此外，被称为博弈论的一系列决策技巧可以帮助阐明问题--包括对暴力与非暴力的选择—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一些策略。

简单说来，博弈论认为，在涉及当事双方（博弈者）的情形下，决定结局或报偿的不仅是其中一方采取的行动，还包括双方之间如何互动。没有这一相互作用的关系，“博弈”就不会太困难：即一方可以不顾对方的反应而不择手段地为自己谋求最佳结局。例如，如果天下雨，不管对方做什么，正确的“步子”是带雨伞。天气不会因任何人的行为而受到影响；因此，各方可以随心所欲地行事，不用去考虑对方的行动。

另一方面，想象一下，有两个人发现一小叠钱。对他们两人可能最有利的做法是考虑到对方：例如平摊这笔意外之财，而不是一方试图将其据为己有，从而可能导致双方为此争吵。博弈论的用途正是在于最终结局不单是由甲方来决定，而且同时也由乙方来决定。

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决定往往不像上例中平分钱财那样直截了当。更糟糕的是，这样的决定往往提供了不合作的契机，特别是在一方的合作意愿容易被对方不公平地利用的情况下。毫无疑问，谋求防止冲突和避免暴力的个人和社会群体经常遇到这样的情况。

简言之，放弃竞争、选择合作的非暴力一方不断面临的一个风险是，他们可能输给更具侵略性和更愿意使用暴力的一方。在上例中，两个人发现一叠钱，但如果其中一人掏出枪说：钱归我所有，而另外一人采取非暴力手段，那么必然的结果是使用暴力者因其暴力行为而受到奖励（得到这笔钱），而坚持非暴力者则一无所获。或者按马基雅维里 (Machiavelli) 的名言所说：“一个坚持在每件事情上行善的人必定会在不善的人中遭罪。”

非暴力解决方案

但是希望依然存在：博弈论不仅帮助我们理解该问题，而且还揭示并支持非暴力的解决方案。由博弈论演绎出的“囚徒困境”（The Prisoner's Dilemma）在广义上是合作与竞争的演变模式。像多数模式一样，它虽流于简单，却能帮助我们澄清思绪。

假设两个人，或两个团体，甚至两个国家都可以选择非暴力或暴力。（理论家们将这样的选择概括为“合作”与“背弃”，或“善意”与“恶意”，其中包括军备竞赛和实施贸易壁垒等国际事务。）如果双方选择非暴力，而每一方均因此得到回报：即和平解决双方的争端，或者就捡到钱而言，双方不用打斗便各得一份。如果双方选择暴力，那么每一方得到的则是不同的报偿：可能是被打伤。但是如果一方选择背弃而另一方选择合作，那么使用暴力的一方得到的是所谓的背弃的诱惑（即此例中的全部现金），而合作的一方（在另一方选择暴力时采用非暴力行动）得到的则是当笨蛋的后果，即一无所获。

要了解下一步发生了什么，可想象一下博弈双方的推理：“那个家伙要么跟我合作（采用非暴力），要么背弃我（使用暴力）。如果是前者，那么我的最佳选择是威胁使用暴力，因为这样我便能得到最高的回报，而他--一个笨蛋--什么都得不到。另一方面，他可能会背弃并威胁使用暴力，如果是这样，那么我的最佳选择以牙还牙，因为即使这种选择使我面临一场恶战，但是至少比做一个笨蛋和输个精光要好。”

根据这种严密的逻辑推理，双方都更愿意使用暴力，这确实反映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困境，因为双方在作出这样的选择时均得到惩罚（就个人而言是打架，就国家而言可能是劳民伤财的军备竞赛或贸易战），而于双方都有利的最佳报偿本来可以是合作与非暴力带来的共同利益。

“囚徒困境”是模拟这一困境的有用工具，即担心出于善意的选择会使自己遭受恶人的伤害（与马基雅维里的理论一致）。

另一方面，“囚徒困境”不是分析这一情况的唯一方法。例如，就暴力和非暴力而言，一个更恰当的模式可能是所谓的“懦夫游戏”（game of Chicken）。它很像“囚徒困境”，但是在这个模式中受到惩罚是最坏的报偿：相互打斗—或者做出打斗的威胁—的代价大于做一个笨蛋和完全避开冲突的代价。在“懦夫游戏”中，两个驾车人迎面行驶，两人都想诱使对方扭转方向，以避免相撞。扭转方向的一方（相当于“囚徒困境”中提供合作的一方）被认为是“懦夫”，而直行的一方（相当于“囚徒困境”中背弃的一方）获胜。然而，问题在于，如果当事双方都不合作，试图利用对方的善意独自谋取利益，结果就是两败俱伤！

反复互动

简单化的博弈论模式的另一个假设是，只有一种可能的报偿，而且任何互动只是一次性的。但实际上，个人和群体之间的互动是反复的，他们的行为可以根据此前情况的变化而改变。因此，双方对采取一系列非暴力、合作性的互动有真正的兴趣，因为无论是“囚徒

困境”还是“懦夫游戏”，非暴力合作得到的回报始终优于相互使用暴力带来的惩罚。所以，这一结局确实能够给各方带来最高的回报。

有趣的是，即使是在孤立的一次性互动关系中，当严格的理性思考表明背弃是“合乎逻辑”的反应时，大多数人仍然倾向于尝试合作，特别是在他们认识到互动会反复发生的情况下，因为在反复互动中，不仅是互相背弃（使用暴力）的选择带来反复惩罚，而且是互相合作（非暴力）的选择带来持续的回报。

例如，数学和计算机模拟显示，简单的一报还一报的策略能够获得最高的报偿，即便在典型的“囚徒困境”中也是如此。如果一方在游戏开始时合作，此后双方只需要重复前一轮游戏中对方的行动。因此，甲方通过提供合作促使乙方也提供合作，如此反复循环。结果，双方都得到非暴力合作的反复回报。反之，如果甲方采取背弃的做法，乙方为免于再次被利用也会采取背弃做法，这种可能性会阻止甲方从一开始就选择背弃。

莫汉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不同意冤冤相报的行为，但他强调必须把 satyagraha（他提出的积极非暴力主张）同被动默认或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冲突区别开来。他还相当明确地指出，非暴力活动人士通过自身的行动最终会改变可能的背弃者的行为，并且，通过自身的榜样和牺牲精神（用博弈论的术语来说就是偶尔做傻瓜），他们能够成就博弈理论家通常不予以考虑的事情：即通过诉诸对方天性中好的一面来改变其行为。

如果一名受害者用更大的暴力应对暴力，即所谓“以牙还牙”，他或她的行为属于可预知甚至是本能的行为，但这种行为往往会进一步强化对方的攻击行为，甚至会在某种意义上证明了对对方最初使用暴力的正当性，至少对方会如此认为。人们可能认为：受害者如此狂暴，那么他或她或许应当受到暴力对待！此外，人们广泛认为社会领域存在着类似于牛顿第一定律的抗衡力，即施加一个作用力必定产生同等的反作用力。因此，如果甲方袭击乙方，乙方予以还击，几乎总会导致甲方再次袭击。甘地不喜欢圣经中“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训喻，他认为，如果每一个人都如此行事，整个人类很快都会变成没有牙齿的盲人。

相反，如果乙方的回应是非暴力的话，它不仅会打破愤怒和仇恨之链（类似于印度教中生与再生的因果链），而且会使甲方处于一个其意想不到的境地。甘地写道：“我竭尽全力，力挫暴君刀剑的锋芒，但不是靠拿起更锋利的武器，而是通过挫败他对我使用武力抵抗的期望。”这样的抵抗既不容易，也不可能不痛苦，但是博弈论和甘地在南非和印度的经历、以及马丁·路德·金和其他维权人士在美国的经历都证实，非暴力可以取得辉煌的成就。

古罗马政治家和哲学家西塞罗（Cicero）在《致友人书信》（Letters to His Friends）中问道：“对武力不施武力，则若何？”研究非暴力运动的学者会回答说：“手段多矣。”他们还会质问，若针对武力而使用武力，是否能成就任何有效、持久或值得献身的事业。归根结底，正如我们已经看到，双方均诉诸武力只会导致博弈理论家指出的双方背弃的惩

罚，从而对各方造成伤害。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也像甘地一样非常务实，注重实效，他写道：“以暴力对暴力更使暴力倍增，就像给没有星辰的黑夜增添黑暗。黑暗无法驱除黑暗；只有光明才能驱除黑暗。仇恨解除不了仇恨，只有爱才能解除仇恨。”

总之，博弈论帮助说明了进行合作的障碍，揭示了“和睦相处”不像很多人希望的那样简单，亦不是天性使然。但它同时表明，如果能够说服各方从更广的角度考察其处境并进而考察其面临的机会，人类并非注定要在一个无休止的惩罚性背弃和痛苦竞争的霍布斯世界中生活。

本文所表达的见解并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和政策。

旺加里·马塔伊：和平之树

肯尼亚的旺加里·马塔伊（Wangari Maathai）发起成立了社区组织“绿带运动”（Green Belt Movement），植树造林，保护生物多样性，因而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非洲女性。在此之前，很少有人把环境的恶化与人权和民主问题等同起来。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变化。

设在挪威的诺贝尔奖委员会 2004 年宣布评奖结果时说：“地球上的和平取决于我们保护自身生存环境的能力。”

马塔伊的整个职业生涯表明，在肯尼亚和全世界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确保可持续发展，与民主和人权的进步以及减少贫困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她的行动向我们展示：小型社区和贫困人口能够通过和平、非暴力手段给自己的生活带来显著变化。

马塔伊在 2004 年 12 月的诺贝尔奖答谢词中说：“在整个绿带运动中，数以千计的普通公民被动员起来，加强了自身能力，积极行动，推动变革。”她说：“他们学会了战胜恐惧和无助感，行动起来，捍卫民主权利。”

马塔伊在开始这项工作时，不一定看到了这些联系。起初，植树不过是满足农村妇女需要的一种直接方式，因为她们负有照顾家庭的主要责任——捡拾烧柴、赚取额外收入、防止水土流失、获取清洁饮水和更好的收成。

但马塔伊认为，还有一个同样重要的长期结果。她说：“这些妇女往往首先意识到环境受到破坏，因为资源日渐减少，越来越无法维持家庭生计。”

在她的回忆录《永不屈服》（Unbowed）中，马塔伊回忆起她小时候家乡植物茂密、土壤肥沃的景象。她写道：“季节非常有规律，你几乎可以肯定地预期三月中旬季风将带来雨水。”

但是，几十年之后，她亲眼看到，季节越来越难以预料，土地因人口增长和往往是腐败的政府无视贫困人口和自然界的需要滥砍滥伐而受到严重破坏。

在种植了 4000 多万棵树苗后——其间建立了泛非洲绿带网络（Pan-African Green Belt Network）——马塔伊和她领导的绿带运动还了解到环境问题与良治及保护人权等更广泛的问题之间的联系。

马塔伊曾获得美国两所大学的学位和内罗毕大学的博士学位。在她的草根运动开始与政府内部的普遍腐败现象作斗争时，特别是针对在内罗毕的独立花园（Uhuru Park）建造一座办公大楼的计划展开较量时，她遭到逮捕，监禁和殴打。

但是，她胜利了。马塔伊在 2002 年入选肯尼亚议会，她现在担任主管环境、自然资源和野生动物工作的助理部长。

马塔伊在诺贝尔奖答谢词中说，绿带运动虽然最初不涉及政治议题，但参与者“很快意识到，如果没有民主空间，对环境进行负责任的管理是不可能的。因此，树在肯尼亚成了民主斗争的象征。……后来，树也成为和平与化解冲突的象征。”

本文所表达的意见不一定代表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希林·伊巴迪：信仰自由

听过 2003 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希林·伊巴迪 (Shirin Ebadi) 讲话的人，无论同意她的观点与否，都不怀疑她坚定不移地致力于人权和政治自由事业的精神。

一位加拿大籍伊朗裔律师在伊巴迪于多伦多发表演讲后在 Iranica.com 网站上评论说：“她所表现出来的精力和激情使（她的）每一个字如咚咚鼓声，在讲话结束后仍在大厅里回荡。”

诺贝尔奖委员会在宣布这一奖项时说：“作为一名律师、法官、演讲人、作家和社会活动家，她在自己的祖国伊朗大声疾呼，她的声音远远超越了国界。她作为一名优秀的职业工作者、一个勇敢的人挺身而出，从不畏惧她自身安全受到的威胁。”

伊巴迪生于 1947 年，毕业于德黑兰大学，并于后来在司法部工作时在德黑兰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她是伊朗第一位女法官，曾担任德黑兰市法院院长。在 1979 年发生伊斯兰革命后，妇女被视为不适于担任这样的职务，她因此被迫辞职。当局让她在她曾经担任院长的法院当书记员。

伊巴迪辞了职，开设了自营律师事务所，并就一系列法律问题大量写作，特别是与妇女、儿童和家庭法有关的议题。她还开始受理难度大、具有潜在危险的涉及压制自由言论和人身骚扰的案件，甚至受理了涉及被与政府安全部门有关系的人杀害的改革人士的案件。英国广播公司 (British Broadcasting Service) 的一位中东分析人士评论说：“她拒绝保持沉默并愿意受理政治上敏感的案件，这为她赢得了世界各地人权组织的敬佩。”

尽管遭到来自政府的威胁和骚扰，伊巴迪为人权，特别是为妇女和儿童的权利展开的多方斗争继续在伊朗和国际上引起反响。在国内，她于 1995 年帮助建立了支持儿童权利协会 (Association for Support of Children's Rights)，2001 年建立了捍卫人权中心 (Human Rights Defense Center)。她继续大量写作和经常外出旅行，到欧洲、美国和很多其他国家就社会公正和妇女在伊斯兰教中的角色等问题发表演说。

伊巴迪谴责国外对伊朗和其他国家事务的干涉——“我坚决认为，暴力不会带来任何有用和持久的东西”——但同时也坚决强调自由与民主理想的普世性，特别是对于妇女而言。在回忆录《觉醒中的伊朗》 (Iran Awakening) 中，她指出，旧政权规定强迫妇女摘下头巾，而新政权则要求妇女重新戴上头巾。“礼萨·汗 (Reza Shah) 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把妇女的身体当作政治议程来采取行动的伊朗统治者。”

2006 年，伊巴迪与其他诺贝尔奖得主创立了妇女诺贝尔行动计划 (Women's Nobel Initiative)，旨在“汇聚我们的非凡经历，团结一致，为实现公正与平等的和平而努力”。两年后，该组织对伊朗政府重新发起的骚扰和恐吓埃巴迪和她领导的人权组织的行动提出谴责。

伊巴迪 2009 年 1 月对伊朗国际人权运动 (International Campaign for Human Rights) 说：“无论有多大的压力，我都不会离开伊朗，不会停止我的人权活动。我将继续走这条道路。”

伊巴迪在《觉醒中的伊朗》中写道：“过去 23 年里，从我被剥夺法官职务那天起……我就一再重复这个主张：与平等和民主谐调一致的对伊斯兰教的解释是对信仰的真实表达。束缚妇女的不是宗教，而是那些希望把她们禁锢起来的人下达的有针对性的专断命令。我的工作正是基于这一信念以及对伊朗的变革必须是来自伊朗内部的和平变革的信念。”

本文所表达的见解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乔迪·威廉姆斯：地雷与网络

乔迪·威廉姆斯（Jody Williams）和她所在的国际反地雷组织（International Campaign to Ban Landmines，简称 ICBL）一道获得 1997 年诺贝尔和平奖。一方面，她的努力促成了取缔杀伤性地雷的国际公约，另一方面，她帮助建立的一个由富有奉献精神的公民组成的全球网络成为通过非暴力途径推动社会变革的新一代公民组织的楷模，大大增强了此类组织的能力。人们至今仍然问她：在这两项成就中，哪一项最具有历史意义呢？

对此或许没有明确的答案，因为这两项成就完全连为一体，难分彼此。但毫无疑问，威廉姆斯和国际反地雷组织发起了今天最成功的国际和平行动，并且在令人不可思议的短时间内达到目标。

在当今宽带互联网时代，迅速、灵活的网络具有极大的威力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威廉姆斯和国际反地雷组织率先展示了分散的全球网络如何高效运作。

在 19 世纪 80 年代，从事人道主义救援、发展和医疗保健的组织开始认识到，从巴尔干和中东到非洲和东南亚的广大地区因数以百万计的地雷和军用爆炸物的存在而受到污染，沦为荒地。并且，这些军火在导致布雷的冲突结束很久之后仍在摧残和毁灭生命。

威廉姆斯在诺贝尔奖答谢词中说：“地雷永远在那里等候牺牲者。”“它是最完美的士兵，它是永久的‘哨兵’。战争结束了，而地雷继续摧残生命。”

六个非政府组织于 1992 年联合建立了国际反地雷组织。这些组织善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持之以恒，而且非常走运。

首先，他们有意保持国际反地雷组织的性质，即一个由独立团体组成的、没有一个中心办公室或官僚机制的松散联盟。首先，他们利用当时的先进技术（电话和传真机，在反地雷运动的最后一年还利用了电子邮件）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通讯网络。其次，国际反地雷组织坚持进行彻底的实地调查，以尽量保证他们所用的事实和数据权威性。威廉姆斯自己与人合写了一篇报告，对四个国家中存在的大量地雷所造成的经济和社会后果进行了详细的研究。

国际反地雷组织的成立也恰逢其时。冷战的结束使各国能够从新的视角来审视和平与安全问题，并使公民团体得以要求与政府合作采取国际行动——既不充当对抗者也不是附庸。威廉姆斯写道，国际反地雷组织“动员了强大的世界舆论反对杀伤性地雷，以至于在五年间就谈判达成了一项明确和简单的条约。这项由 122 个国家于 1997 年 12 月签署的条约成为有约束力的国际法律，其立法速度超过历史上任何类似的条约。这是国际上第一次全面禁止一种广泛使用的常规武器。

美国虽然不是该条约的缔约国，但它依然是世界上人道主义排雷的最大捐助国，并且禁止所有“永久杀伤性地雷”。美国只保留在几个小时或几天——而不是几年——之后失去杀伤力的装置。

国际反地雷组织没有满足于它所取得的非凡成就。它发布《地雷监测报告》（**Land mine Monitor Report**），对履行《禁雷公约》（**Mine Ban Treaty**）的情况进行评估。在该组织的密切关注下，各国已经销毁 4200 万枚库存地雷，仅 2007 年就销毁 50 万枚。据这份报告说，2007 年，排雷项目艰苦地清除了 122 平方公里的土地，每年地雷造成的伤亡人数持续下降。

目前在休斯顿大学社会工作研究生院（**University of Houston's Graduate School of Social Work**）任教授的威廉姆斯在一篇论述诺贝尔奖影响的文章中写道：“我们的变革模式虽然有时受到攻击，但它继续鼓舞着世界各地人民。他们坚信，如果我们——公民社会和政府——共同努力，就能创造这样一个世界：以个人安全保障为全球安全保障奠定基础，从而给我们带来每一个人应该享有的和平、公正与平等。”

本文所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代表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杰弗里·卡纳达——儿童传送带

杰弗里·卡纳达（Jeffrey Canada）是一位幸运儿：他是非洲裔美国人，在纽约市的一个没有阳光的街区长大，但最终得以离开这个深陷暴力和贫困、学校破败不堪的地方，并获得哈佛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但是，卡纳达没有忘记自己的根；他很快回到纽约市哈莱姆区（Harlem），成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和儿童福祉的倡导者。

卡纳达不仅自己取得成功，而且帮助了数以百计可能由于贫困而偏离正道的孩子。然而，他认为这还不够。

据芝加哥一个题为“美国生活”（This American Life）的公共广播电台节目介绍，到1980年代，卡纳达认识到，只拯救几个孩子不会结束哈莱姆区或其他地方的普遍贫困；他的组织必须努力拯救所有需要帮助的孩子。

他说：“为了产生真正的影响，我们要有远大志向，我们必须帮助数以千计的孩子，今后将是数以万计的孩子。我们要从这些孩子出生时就着手，直到他们大学毕业。”

他的设想前所未闻，又需要巨额资金。但是，58岁的卡纳达干劲十足，并极富个人魅力。他正在通过哈莱姆儿童特区（Harlem Children Zone）的形式把他的理想变为现实。他创建的这个组织现在负责哈莱姆中心区一万多名儿童的教育、医疗和社会服务，2009年的年度预算估计为4000万美元。

卡纳达的成就引起了许多领导人的注意，他们认为，这种模式表明，只要对儿童及其福祉承担绝对责任，就能够打破贫困的桎梏。《纽约时报杂志》编辑保罗·图赫（Paul Tough）最近出版了一本关于卡纳达的新书——《千方百计》（Whatever It Takes），该书名即反映了上述承诺。关注卡纳达的努力的领导人包括巴拉克·奥巴马总统，他在竞选总统期间称赞哈莱姆儿童特区是“一项内容全面、全民动员的抗击贫困的努力，真正在拯救原本毫无机遇的一代儿童。”

观察人士不仅为卡纳达的设想而且为他取得的成果而赞叹。去年，在州考中，哈莱姆儿童特区的三年级学生几乎全都达到或超过了三年级水平，这样的结果在纽约贫民区学校是前所未有的。

卡纳达强调的一点是早期接触语言。关于早期语言接触的重要性，研究显示，贫困家庭和白领家庭之间的一个关键差别既不是种族也不是收入，而是——如作家图赫所指出——“你的父母在你小时候是否对你讲许多话”。

研究人员发现，在中产阶级家庭中，儿童从出生到3岁——这是大脑发育最快的阶段——听到的词（包含大量重复）比贫困家庭儿童多2000多万。换言之，像每天晚上给孩子读书这样简单的事情——哈莱姆儿童特区敦促所有孩子的父母都这么做——可以给孩子的一生带来巨大和有益的结果。

但是，读书只是卡纳达具有革命性的战略——他称之为“传送带”——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即哈莱姆儿童特区不只是在某些时候介入孩子们的生活，而是在“从出生到上大学”期间免费提供全方位的服务。这一传送带服务包括哈莱姆儿童特区为孕妇和新妈妈提供的著名“婴儿学院”（Baby College）、称为“哈莱姆宝宝”（“Harlem Gems”）的学前教育项目和称为“希望学校”（Promise Academy）的特许学校——全都辅以免费医疗和牙科保健、放学后活动，以及一些特别项目，例如为预防肥胖和治疗猖獗的儿童哮喘而提供的健身项目。然后，随着第一代儿童逐渐长大，哈莱姆儿童特区将继续伴随他们，直到中学和大学毕业。

卡纳达在电视新闻专访节目《60分钟》上说：“他们得到中产阶级和中上层家庭孩子享有的一切。他们得到安全保障，生活有规律，学习内容丰富，他们参加文化活动；有成年人关爱他们，并随时准备为他们提供任何帮助。我是说，只要能够让这些孩子走正道，我做什么都行。”

本文所表达的意见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弗朗辛·普罗斯——文字与作家的捍卫者

大多数作家关注言论自由，这是顺理成章的看法。但是，美国知名作家弗朗辛·普罗斯（Francine Prose）把她对作家和写作的承诺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她自 2007 年起一直担任美国笔会（PEN American Center）会长。美国笔会是创建于 1221 年的国际笔会的一个分会，该组织是世界上最早的作家人权组织。

在普罗斯之前，一系列著名作家曾在美国笔会任职，其中有剧作家阿瑟·米勒（Arthur Miller）和尤金·奥尼尔（Eugene O'Neill）、散文作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和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和约翰·斯坦贝克（John Steinbeck）、以及诗人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和罗伯特·弗罗斯特（Robert Frost）。

普罗斯生于 1947 年，作为一名小说家、散文家和公共事务评论家而广泛受到尊敬。她同时兼做编辑和教师。她的小说作品受到高度好评，反映一系列广泛的题材，从学术领域（《蓝天使》，Blue Angel）直至不宽容和上天恩惠之含义（《洗心革面》A Changed Man）。她最近出版的小说是反映少女成年经历的（《金色丛林》Goldengrove）。她的非小说新作是《像作家那样阅读：嗜书者和未来作者指南》（Reading Like a Writer: A Guide for People Who Love Books and for Those Who Want to Write Them），该书反映了她自己最喜爱的两件事。

美国笔会（其英文名称 PEN 取自“诗人、编辑、小说家”（poets, editors, novelists）三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是国际笔会在 99 个国家 144 个分会中最大的一个，拥有超过 3300 名专业会员。国际笔会在其宪章中宣称，它“信守思想在每一个国家和所有国家之间无障碍地传播的原则……反对以任何形式压制言论自由……和任意的审查。”美国笔会曾就个人隐私和司法监督等议题对美国政府提出批评。例如，美国笔会与代表图书馆员、图书销售商和作家的各组织一起呼吁更改在 9.11 恐怖事件后制定的《美国爱国者法》（US Patriot Act），以更好地保护美国人的隐私。美国笔会还强烈批评授权美国政府扩大电子监督的法律，称它“毫无必要地抛弃了宪法为禁止‘签发授权广泛的传票和进行不合理的搜查而提供的保护。’”

在普罗斯的领导下，美国笔会还继续大力开展捍卫和保护世界各地作家的斗争。普罗斯特别批评中国在 2008 年西藏发生骚乱期间对新闻报道施加“令人窒息的限制”以及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未能履行允许自由和公开报道的承诺。

国际笔会将每年 11 月 15 日定为“狱中作家日”（Day of the Imprisoned Writer），以“表彰所有勇于反抗压迫和捍卫言论自由的作家”。2008 年获得笔会表彰的五名作家是：

- 伊努拉·法图拉耶夫 (Eynulla Fatullayev) (阿塞拜疆)，因政治评论和调查一名新闻记者被谋杀的事件而服刑。
- 茨仁唯色 (Tsering Woesser) (中国)，作家和诗人，“因写作有关西藏的内容而多次和长期遭受骚扰”。
- 穆罕默德·萨迪克·卡布端德 (Mohammad Sadiq Kabudvand) (伊朗)，新闻记者和争取库尔德人权利的活动人士，现被监禁。
- 梅丽莎·罗西亚·帕蒂尼奥·西诺斯特罗萨 (Melissa Rocia Patiño Hinostroza) (秘鲁)，学生和诗人，因被指控与恐怖分子有牵连正在受审，尽管这项指控缺乏证据。
- 《赞比西河的鳄鱼》 (The Crocodile of Zambezi) 的编剧、演员和剧组人员 (津巴布韦)，该剧遭到禁演，编剧和剧组人员遭到威胁和殴打。

普罗斯说：“笔会为弘扬文学和促进世界作家之间的联系而作的努力永远是重要的。但是，我们对言论自由的承诺——包括保障人权和拯救世界各地作家的生命、保护美国 and 外国新闻记者的自由、与政府对读者隐私权的侵犯作斗争、以及在监狱和学校展开工作——从未像现在这样具有重要性和深刻的必要性。”

本文所表达的见解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凯瑟琳·千 (Katherine Chon) 和德里克·埃勒曼 (Derek Ellerman) ——与人口贩运作斗争的大学生

2001 年，位于罗德岛州普罗维登市 (Providence) 的布朗大学有两位学生在一次用餐时随意聊天，其话题后来演变成美国和日本最大的打击人口贩运的组织之一。

凯瑟琳·千 (Katherine Chon) 当时与她的同学德里克·埃勒曼 (Derek Ellerman) 谈论美国废除奴隶制的历史，后来又谈到现代奴役的问题。此后不久，当地报纸报道了一则有关六名韩国妇女被迫在普罗维登一家妓院提供性服务的消息，使她立即意识到自己要做的事情。

她在 2007 年《妇女健康》(Women's Health) 杂志刊登的一篇文章中说：“最令我不能接受的是，她们跟我年龄相仿，而且是来自我原来的祖国。”

结果，凯瑟琳·千和埃勒曼创建了“北极星项目” (Polaris Project) ——该组织以在南北战争 (1861-1865) 爆发前指引美国南方黑奴通过“地下通道” (Underground Railroad) 奔向自由的北极星命名。

他们两人决定建立一个网站，并制定了一项运作计划，要为人口贩运活动受害者提供直接和切实的帮助。他们向布朗大学的年度创业竞赛项目提交了他们的计划。尽管该网站属于非营利组织，仍然获得了 12,500 美元的二等奖。他们于 2003 年在华盛顿特区设立了办公室。

他们面临艰巨的挑战。埃勒曼写道：“反人口贩运运动还处于早期，它面临的却是源于最难根治的社会弊病的犯罪组织。”

据联合国估计，在任何一个特定时间，都有 1230 万人从事强迫劳动、奴工、童工和遭受性奴役。其他各种来源的估计数字之间存在巨大差别，在 400 万到 2700 万之间。

北极星组织从多方面入手解决人口贩运问题。它努力寻找受害者并主动与她们联系，提供帮助，包括建立多语种求救热线电话以及向受害者提供社会服务和过渡性住房。该组织运作的“国家人口贩运资源中心” (National Human Trafficking Resource Center) 提供一个可从全美各地拨打的反人口贩运热线电话。

该组织还呼吁州和联邦政府制定更有力的打击人口贩运的法律，并努力吸引社区成员参加地方和全国的基层工作。北极星组织拥有 30 多名全职工作人员，他们分布在华盛顿特区、新泽西州纽瓦克市、科罗拉多州丹佛市和东京等地。

虽然积极展开活动的反人口贩运组织很多，但北极星是少数几个直接通过加强执法——而不只是帮助受害者——来打击这个犯罪行业的组织之一。

埃勒曼指出，由于犯罪分子往往把人口贩运视为相对低风险、高利润的活动，因此，“制定重点战略，以阻止其获得高额利润，同时加强起诉和定罪，是打击人口贩运最有效的手段。”埃勒曼还与支持社会公益创业的“阿肖卡协会”（Ashoka）就打击人口贩运的议题进行合作。

在未来一年，北极星组织计划加强其全国性政策项目，包括为各州提供打击人口贩运的立法样本。凯瑟琳·千和埃勒曼还希望加强北极星组织的全国热线电话——该热线的通话量在去年增加了两倍，达到 6000 起，并因此找到 2300 名可能的人口贩运受害者。

凯瑟琳·千说：“这个中心使我们能够从各地社区获取信息。我们接到的电话能够帮助我们找到更多受害者，把她们介绍给各服务中心，并搜集更多证据起诉贩运分子。”

她举了一个例子。一名教师在接受了如何发现贩运受害者的培训之后，打电话报告有两名拉美裔女孩在课后活动项目中失踪。这两个女孩后来被找到，有关贩运分子受到起诉。

凯瑟琳·千还希望与其他国家的组织建立更广泛的地区伙伴关系。她说：“我们打算集中力量瓦解特定市场和特殊类型的犯罪网络——如亚洲人开的按摩室或对拉美裔妇女和儿童的贩运——其中每一类市场都涉及不同的因素。”

埃勒曼和凯瑟琳·千对他们所从事的事业充满信心，并认为自己有能力促成重大变化。

凯瑟琳·千在接受一家杂志的采访时说：“我相信个人能够产生影响。追求能够激发你的热忱的事业，全身心投入，不要畏惧挑战。”

埃勒曼写道：“好消息是这场斗争能够取胜。这一事业成功的关键是有经验、有远见而又讲求实效的组织和领导人。”

本文表达的见解不一定反映美国政府的观点或政策。

参考资料

有关实现社会变革的非暴力途径的参考资料

书籍和文章

Ackerman, Peter, and Christopher Kruegler. *Strategic Nonviolent Conflict: The Dynamics of People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Westport, CT: Praeger, 1994.

Asher, Sarah Beth, Lester R. Kurtz, and Stephen Zunes, eds. *Nonviolent Social Movements: A Geographical Perspective.*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9.

Barash, David P. *The Survival Game: How Game Theory Explains the Biology of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New York, NY: Times Books, 2003.

Chernus, Ira. *American Nonviolence: The History of an Idea.*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2004.

<http://spot.colorado.edu/~chernus/NonviolenceBook/index.htm>

Helvey, Robert. *On Strategic Nonviolent Conflict: Thinking About the Fundamentals.* Boston, MA: The Albert Einstein Institution, 2004.

<http://www.aeinstein.org/organizations/org/OSNC.pdf>

Horgan, John. “Has Science Found a Way to End All Wars?” *Discover*, published online (March 13, 2008).

<http://discovermagazine.com/2008/apr/13-science-says-war-is-over-now>

King, Mary. *Mahatma Gandhi and Martin Luther King, Jr.: The Power of Nonviolent Action.*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1999.

King, Martin Luther. *Dr. Martin Luther King, Jr.’s Radio Address to India.* All India Radio (March 1959).

<http://www.sajaforum.org/2009/01/history-50th-anniversary-of-martin-luther-king-jrs-india-visit.html>

Kurlansky, Mark. *Nonviolence: Twenty-Five Lessons From the History of a Dangerous Idea.* New York, NY: Modern Library, 2006.

Kurlantzick, Josh. “Terrorists Against Terror.” *Asia Pacific Defense Forum*, vol. 33, no. 3 (3rd quarter, 2008): pp. 36-40.

Lakshmi, Rama. “Son Retraces King’ s ’ 59 India Pilgrimage.” The Washington Post (February 18, 2009).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9/02/17/AR2009021703040.html>

Martin Luther King and the Montgomery Story (in English and Arabic, comic book format).

<http://www.hamsaweb.org/comic/>

Sharp, Gene. Politics of Nonviolent Action. Boston, MA: P. Sargent Publishers, 1973.

Shirky, Clay. Here Comes Everybody: How Digital Networks Transform Our Ability to Gather and Cooperate. New York, NY: Penguin Press, 2008.

Staples, Lee. Roots to Power: A Manual for Grassroots Organizing. Westport, CT: Praeger, 2004.

Talbot, David. “The Geeks Behind Obama’ s Web Strategy.” The Boston Globe (January 9, 2009).

http://www.boston.com/news/politics/2008/articles/2009/01/08/the_geeks_behind_obamas_web_strategy/?page=full

Teaching Nonviolence. Best Practices of Nonviolent Conflict Resolution.

<http://unesdoc.unesco.org/images/0012/001266/126679e.pdf>

Thoreau, Henry David. “Civil Disobedience.”

<http://thoreau.eserver.org/civil.html>

Warren, Mark R. Dry Bones Rattling: Community Building to Revitalize American Democrac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1.

影片：纪录片和传记

A Force More Powerful (2003)

<http://www.aforcemorepowerful.org>

Producer: York Zimmerman, Inc.

Synopsis: This television series profiles how millions of people chose to battle brutality and oppression during the 20th century with nonviolent weapons — and won.

Running Time: 180 minutes

Bringing Down a Dictator: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2003)

<http://www.yorkzim.com/pastProd/bringingDown.html>

Producer: York Zimmerman, Inc.

Synopsis: Learn about nonviolent struggle and action as a means of political defiance. This film also explores how nonviolence helped depose Serbian dictator Slobodan Milosevic.

Running Time: 56 minutes

Eyes on the Prize (1987)

<http://www.pbs.org/wgbh/amex/eyesontheprize/index.html>

Producer: Harry Hampton

Synopsis: Eyes on the Prize is an award-winning documentary series on the U.S. civil rights movement that brilliantly illuminates the struggle for racial equ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Running Time: 14 hours

The Fight in the Fields: Cesar Chavez and the Farmworkers' Struggle (1997)

<http://www.pbs.org/itvs/fightfields/>

Producer: Paradigm Productions

Synopsis: The Fight in the Fields follows the first successful organizing drive of farm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 while recounting the many failed and dramatic attempts to unionize that led up to this victory. Among the barriers to organizing was the Bracero Program, which flooded the fields with Mexican contract workers between World War II and the 1960s.

Running Time: 120 minutes

Freedom on My Mind (1994)

<http://www.film.com/movies/freedom-on-my-mind/14697772>

Producer: Connie Field

Synopsis: Telling the dramatic story of the Mississippi voter registration project from 1961 to 1964, Freedom on My Mind is a landmark documentary that chronicles the most tumultuous and significant yea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U.S. civil rights movement.

Running Time: 104 minutes

Gandhi (1982)

<http://www.imdb.com/title/tt0083987/>

Producer: Richard Attenborough

Synopsis: The biography of Mahatma Gandhi, who rose from a small-time lawyer to India's spiritual leader through his philosophy of nonviolent but direct-action protest.

Running Time: 188 minutes

倡导非暴力的非政府组织

Burma Global Action Network

<http://www.burma-network.com/>

Día de Solidaridad con Cuba

<http://www.facebook.com/pages/Dia-de-Solidaridad-con-Cuba/12432514783>

Global Youth Movement

<http://www.globalyouthmovement.com/>

Invisible Children

<http://www.invisiblechildren.com>

One Million Voices Against FARC

<http://www.facebook.com/pages/One-million-voices-against-FARC/10780185890>

One Million People Against Crime in South Africa

<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6340297802>

美国国务院对上列资料的内容与可得性不承担责任。所有网站链接在 2009 年 3 月均可接通。